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项目



古村掠影

中国的村落与民居

文

王景和 著

最后的乡村

中国乡土影像志

新华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
资助项目



古村掠影

中国的村落与民居

Ⅷ

王景和 著

最后的乡村

中国乡土影像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村掠影: 中国的村落与民居 / 王景和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6
(最后的乡村: 中国乡土影像志)

ISBN 978-7-5166-1824-0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村落—研究—中国 ②农村住宅—研究—中国 IV. ①K928.5 ②TU2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9017号

最后的乡村: 中国乡土影像志(第一卷)

古村掠影: 中国的村落与民居

作者: 王景和

出版人: 张百新

项目统筹: 程红根

责任校对: 刘保利

选题策划: 张百新

责任编辑: 江文军 沈文娟 张永杰 雒悦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邮编: 100040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装帧设计: 后声 HOPESOUND · 王国鹏
hinkouyaya@163.com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 × 245mm 1/16

印张: 27

版次: 2015年6月第一版

字数: 230千字

印次: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1824-0

定价: 368.00元(全四卷)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联系: 010-63077101

序

温铁军

2015年儿童节那天收到一个陌生老人的短信，居然就有了“少年狂”之类的举动。难道是儿童节的作用……

发短信的是个素未谋面的人，叫王景和，准备出四卷本的丛书《最后的乡村——中国乡土影像志》，要我写序。因为欠下的文债太多实在负担过重，本打算晚饭之后散步给他回个电话婉拒，没承想上云盘浏览了他的资料便“浮想联翩”，当晚竟至于夜不能寐……凌晨爬起来到园子里浇菜，顺手摘了两根黄瓜回到书房，竟然就神差鬼使地放下手头大量工作——那些我永远还不清的文债——即为之序！

之所以如此，乃是我1996年对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做10年总结研究的时候正式提出“三农问题”而报忧得忧以来，在这20多年蹉跎岁月中，对于刻意体现着排斥性“话语粗暴”的各种主流议论早就司空见惯，遂自觉地把勉力“改出激进”的三农工作调整为警醒后人的“立此存

照”。昨晚看他的资料，知道丛书作者王景和在2004年退休之前是新华社的记者，退休之后这10年自己开车跑了27个省市区的农村，辑录了很多实际情况，纯属有感而发，完全没有学会主流那种把邯郸学步大赛仅剩下的裤衩当旗帜挥舞的矫情——他的这些几乎没有技巧的图片和白描的文字，恰能更为客观平实地表达乡土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复杂历程。看上去，此书也属于“吾辈立此存照，留待后人评说”。

何况，今年是我“铁马长河两万里”30周年纪念——1985年6月我曾经率领青年记者组驾驶国产轻型摩托车沿着黄河做了8个省市区历时4个月的大调查！完成调查之后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来得及坐下来把文字和图片辑录成书，乃此生憾事！如今看到有类似的成果问世，不胜唏嘘！也油然而生一种为之序的责任感。

为了方便普通读者理解为什么这个老记者在10年调查之后会以“最后的乡村”来命名此书，

就得先说说乡土中国的历史常识和当代演变的客观情况。

一、乡土中国“去教科书化”的常识简述

一般的教科书都会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若跟着主流纯粹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则：地大不假、物博不真。中国农业人均资源极其有限，根本就玩不起“斯大林主义”或“福特主义”大生产。然而，若把乡土中国作为与自然界多样性内生结合的生态化社会来看，则：多元村社，生生不息；兼业小农，种养永续……

就便多一句嘴：历史和常识“双虚”的食洋不化者把西方人遭遇生态破坏之后才学了点皮毛的东亚数千年永续农业经验 permanent agriculture 出口转内销地搬了回来，在当代中国发起所谓“朴门农业”，岂不“班门弄斧”？貽笑老农民！

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个常识，中国人口占世界

的 20% 却只有世界上 9% 的耕地，如果把那些不适宜耕作的、本来应该退耕的地，比如干旱荒漠带、陡坡耕地都退下来，中国实际上只占有世界大约 7% 的农用地。换句话说，我们的陆地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千米，但是符合农业耕作需要的水、土、光、热四种自然资源互相匹配的面积只占 9.8%，也就是说国土面积很大，但只有不到 10% 是适合农耕的。更大的麻烦还在于：适合农耕的土地也适合城市和工业。所以，城市、农村，工业、农业都在抢这点有限的资源，就导致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一定是复杂的，甚至是尖锐的、对抗性的。

人们看现在老有农民上访告状，为啥呢？农民的房子和地往往是被政府追求现代化偏好的城市和工业给占了。而且，到处有比较低价的、不太合理的农地占领。

可见，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势必随着成千上万的地

方政府都参与现代化竞争而愈发严重。辩证地直白地说：中国城里人越是追求现代化，越是激进地消灭小农村社制的生存方式，基本国情矛盾就越是恶化！也就越失去国家安全的基础。最终，则很可能再度应验了梁漱溟 20 世纪初对民国追求激进现代化的警语“自毁甚于他毁”！

这是个历史性的矛盾，晚清以来任何主观意志都难以改变！

那么，过去中国人靠什么养活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呢？就这么点的资源，只有世界 6% 的水、7% 的地，不仅得养活 20% 的人口，还得为了工业化资本积累用农产品出口换汇，才能支撑城市工业进口关键设备和技术的需求（直到 80 年代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占中国出口额的 80%）！

到底凭什么？乡土中国这个有厚度和弹性的社会经济结构怎么回事？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读者浏览王景和的丛书比看那些洋八股有用，至少能够留下对当代复杂问题的常识性印象。

那，怎样才能深入理解书中介绍的那些现象呢……

二、世界农业的三大类的历史成因及其殖民化背景

我经常讲：北美、澳洲这种土著人口被大规模消灭到只剩不到 2% 的殖民化大陆，与亚洲这种土著人口几乎占 100% 的大陆，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经济学意义上的基本结构存在根本差异，来不得任何照搬西方中心论的邯郸学步；除

非那些主张西方经验具有普世价值高度的人自觉地先走一步蹈海自裁、还得带动占比 98% 的、在西方经验中根本不该存在的亚洲土著人口跟着去……

这个世界可能给中国人再按照西方模式去重新殖民化他人的机会吗？即使可能，中国人难道也得去做“奴隶制三角贸易”那样血腥残暴的事情吗？尽管没有谁敢于公然赞许以“反人类犯罪”为原始积累内涵的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但一味强调只有西方才实现了的那种现代化，则无异于自毁良知去认同反人类犯罪！

有时候，在课堂上会听到年轻人对西方经验体现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直白认同：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阶段既然都是以大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的，那我们也只能如此……有时候，在会议中会听到官员类似的上述表达，虽然委婉包装却仍昭然若揭……

也许，这些或明或暗的表达都来自被反智的教育批量制造出来的产品？！吾辈还未完成启蒙教育！？于是，下列叙述算是补课。

据考古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原生农业区；中国周边则是接受原生农业影响形成农业文明的次生农业区。中国人在大约 9000 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开始进入了稻作农业，从此与水利灌溉有关因而只能聚落于水热条件具备的地方；随后，大约 7000 年前中国人驯化了野生蚕，开始演化成稻谷蚕桑的兼业化村社文明。与此同期，北方沿黄流域兴起了粟稷为主的旱作农业。因此，中国的先民们不仅是较早告别蒙昧

进入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人类族群，而且因为东亚“两河流域”的长江黄河之间距离远大于西亚的“两河流域”，所以西亚是单一作物为主，而东亚却是旱作和水作多元化的生态文明。

本源于亚洲东西两侧形成这两种不同的“原生农业”，扩展出去形成了次生农业地区，构成了东西方两大文明最初的分岔……

在东亚大陆上主要被中国人延续下来的所谓传统农业，就是得益于季风性气候带来的四季热量和降水量的差异，这种自然界本身的气候多样性结构，就使得中国人古代就一定要有水利才能归集天然来水和利用地表水维持生存。因此，距今6000、7000年前的中国部族社会，就已经是一个群体性聚居的、依靠水利灌溉维持的农业文明。

由于村社民众共同建设的坑塘库坝和灌溉的渠系是无法移动的，由此，东亚农村经济普遍存在的兼业化和多样性，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村社制度“内生性”地安土重迁、历朝历代也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直至近代东亚诸国都在“被侵略”的打击下不得不追求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这种传统农业文明才遭遇“生存抑或死亡”的哈姆雷特之问！

既然世界农业分为三大类，那我们跟美国式的、欧洲式的农业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美国是外来人口为主体组建的国家，殖民者到达之后数千万印第安先民大部分都“被减少”了，剩下几十万被放在荒漠地区的“保留地”里。因此，美国基本上是欧洲殖民者在那儿经营的一套复兴希

腊罗马奴隶制为基础的外来人的社会。农业算是复制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那是从大西洋边上的英伦三岛舶来的——周围都是水，湿气重，一到晚上气温下降就下雨，白天太阳一升上来就适合作物光合作用，不需要搞归集地表水的灌溉农业，遂几无村社聚居、而有个体农场分散布局。

如果你比照中国人的都江堰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繁衍生息的那几个岛上，找不到古人用于农业的水库（坑塘库坝）灌溉渠系的遗迹。所以，怎么跟西方人说中国人使用石头工具的时候就开始在亚洲大陆上建坝挖渠，因此才形成群体社会！他们恐怕都听不懂。西方经验中只有奴隶劳动才是群体形式的。

盎格鲁撒克逊农业模式那种得天独厚，本来没有普世性。亏了老天爷照顾，把人家祖先放在那个气候温润、降雨丰沛的岛上，不需要费劲挖渠，人家这种靠天吃饭模式到了美洲也是如此，到工业化时代就一片小麦带、玉米带、棉花带，基本上不用水利渠系，主要是靠资源的规模扩张搞大农场来维持产量。

对我们在当代引入西方经济体制之后的农业变化情况，王景和的书给了许多客观描述，很多人虽然没像他这样身临其境，但也有不同说法。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试图按照西方模式搞三农发展，无论农业产业化还是农村法制化，为什么大多数这化那化都不行？

因为，即使在工业化条件下，西方学者也大略把世界农业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如同现在大家脑子里被灌输的美国梦——电视里很上画面的那种大拖拉机一开，大农场一望无际！这种大农场形态的农业在世界上只有不超过 10 个国家，都是殖民地——外面来的人把本地人大部分减少，把资源占领了，才形成大规模农业的条件。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全部都是外来殖民者占人口的绝对比重。美国 98% 以上，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是 95% 以上。总之，得是外来欧洲白人占了当地人的资源才有那种大农场农业，大农场对应的就是公司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因此，这种规模农业模式在世界上不可能推广，因为大多数国家客观上没有条件。

第二大类是小农场，可以到欧盟国家去看，连早期作为殖民地宗主国、向外输出大批人口的老欧洲，都没有条件形成大农场。老欧盟 15 国只有小农场，而且也不是产业化的，因为 60% 的农场是城里的市民在搞兼业化农业。市民农业就要求绿色环保，于是，绿色政治就在欧盟国家发起。于是，中下层次的中产阶级市民成为欧洲对本地农业采取高壁垒的扶持和保护政策的主要力量。这样高补贴的农业现代化，中国人学不起。

第三大类是东亚小农经济，东亚在远东之远，大家知道中东就到阿拉伯地区，远东这个概念是从英国到印度。远东之远是我们东亚。当年西方殖民扩张的时候，东亚这边来的很少。基本上属于原住民地区，没有如美洲、澳洲那样被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所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国家

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小农经济，在越南、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无论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论何人为领袖，都是维护小农业和村社的利益。可见，东亚农业是世界上不同于西方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单独的一种方式。东亚农业的对应的形式就是日韩（包括中国台湾）模式的综合农协，或者叫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大公司产业化。日本坚持保护农协体制下的小农经济一百多年，至今很少有企业法人能够进入日本农业。

三、讨论农村问题务必坚持调查研究

王景和的四卷本丛书完全来自调查研究。这也是我多年来最为坚持的、也最为推崇的三农问题研究方式。

上面说到世界农业三大类，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制度类型。而如果涉及制度，则需要知道东亚的土地财产占有和分配关系是农业的基本制度。这个基本制度在东亚各国的情况高度一致。即使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推行的土改也是按人平均分；这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土改也都是人均分地没有差异。

但，东亚地权又和西方人讲的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领导下开展的土改不一样。

事实上，世界上凡属于按照西方人讲的“德先生”、“赛先生”领导之下的土改几乎都没有成功。按照西方经济学搞发展中国家农业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国家范例。如若不信，可以到非洲、拉美、南亚去看看，被原欧洲殖民者控制的这些国家口

头上也要搞土改，却没有成功的。即使有少数地区部分成功，现在也都找回去了。比如1954年埃及纳赛尔搞了武装革命，建立了民族主义政权，赶走了殖民者。他上台以后开始给农民分地，但只给20% 几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地就死了。后来萨达特上台，不承认土改，原来分给农民的地已经种上了，地主已经打跑了，已经搞了一场农民革命给20% 多的农民分到了地，在外地主本来也就放弃了。我去调查的时候，当地人说这儿发现石油了，二代地主就回来了说这个地不是你的。农民说我已经种了40年，纳赛尔时代就给了我了。二代们就说：你拿地契来，农民说革命把地契烧了！但，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法制不承认“革命”。埃及的教训是第二代领导人萨达特把第一代领导人的革命否了，40年后的二代地主就来反攻倒算了！那时候，穆巴拉克的军事政权基本上管不了农村，后来就到处发生相当严重的冲突，直到演变为解放广场斗争颠覆了政权。

说到这些事，也是我愿意给王景和作序的原因——他毕竟是靠自费下乡去做了10年的调查研究！当然，大多数在现有制式教育下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于去做农民调查的，我却愿意跑发展中国家做调查。比如尼泊尔的土改，中国人很少去调查，我组织了三次调查。墨西哥萨巴蒂斯塔的土地革命我去了三次。巴西的无地农运动我去了两次。印度的土地问题和农民抗争调查我去了四次。埃及的土改调查才只去了一次就动乱了。

做调查研究的结果，发现按照西方人给定的制度体系和照搬西方的知识谱系来推进发展中国

家的制度变迁，几乎没有一个能成的。而只有东亚才去西方化地完成了自主工业化。整个东亚其他岛国和半岛国家又恰是早期亚洲中心地区的古代原生农业所形成的社会文明扩散而成的次生农业，导致历史记忆下的文化积淀。延续到当代，最终形成的是整个东亚的基本制度——土地均分模式是一样的，其派生的农业制度的内涵本来也是一样的；遂有著名的日韩台（“台”指中国台湾——编者注）模式。东亚诸国中，唯本国似乎在农业领域要搞“脱亚入美”，主流们激进地模仿美国殖民地国家那种搞大农场的做法……

君不见，一百年前美国学者富兰克林·H·金教授来东亚考察，写了一本《四千年的农夫》算是西方解读亚洲小农村社制度下农业实现可持续的经典的著作，主要对中国人的农业为什么长期维持巨大人口的生存并且土壤保持肥力、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美国农业才一百年就造成资源环境不可持续作了对比分析。这本书被我的两个博士生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但因为讨论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真问题，因而不能进入中国高校农经类参考书。

从农业角度看资源环境人口比重等基本条件，就知道西方跟我们的炎黄文明不可能是同一的模式，数千年历史的演化历程也根本不一样。这些基本常识被当代极为落后的制式教育所屏蔽，就搞得越是著名高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人越是容易食洋不化，对社会也如同鸡肋……

四、乡土中国适应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或者说国家战略、民生之基，从自然条件看就不可能与欧美一样。因为，中国处于北纬干旱带，本来应该跟西亚、北非荒漠化地区的情况类似——由于土地处在地球同一纬度上，意味着自然资源决定的人类生存条件应该是接近的。那么，为什么中国有条件维持这么多的农业人口呢？主要是因为东中部平原有太平洋季风带来气候变化，随季风又带来季节性降水，大致形成沿着东北西南走向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所以中国一年有四季，还按照农业需求分24个节气。而西亚北非则只有两季——雨季和旱季——类似于亚洲北部的干旱草原，主要成为游牧部族艰苦生存的地区。

中国西南地区则是靠印度洋水汽上送。因为青藏高原隆起造出了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山高沟深，恰能使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山沟北上，一直爬到秦岭以南，这就有了西南山区的盆地和坝子农业，但与东部类似也得靠灌溉。

此外，大凡不能归集天然来水形成灌溉条件就是农业低产的贫困地区。

由于灌溉大致会保持农业产量均衡，中原农村人口增加，每当气候变暖就逐渐北迁扩大农耕；每当气候变冷就带来北方游牧部族遭遇气候异常、无力抗灾而只能南下的劫掠战争……于是，战国时期遭遇气候变冷迫使游牧部族全面南压，北部六国就都得修长城御边、造成国力损耗，而处于中西部的秦国却得益于兴修水利，直至统一之后连接了六国长城，也大抵是沿着这个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修建。从秦汉时起，因村落聚居文化而根本没有搞

过西方那种奴隶制时代的中国人就已经告别了周朝分封天下的“封建制”，形成了因大一统而具有广大战略纵深的政治国家，也具有了防范北方部族南下洗劫农业社会的基本条件。由此，小农村社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而当秦汉形成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国家的时期，欧洲还处在奴隶制时代，自由民占人口的不到10%；罗马在遭遇匈奴人西进引发的日耳曼南下导致的衰败之后，欧洲才进入千年黑暗的小国林立的封建制时代……至今，欧洲政治家羡慕的愿景，仍是中国2000多年前的秦统一。

农村中的很多老典型，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直接验证了我关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经验归纳，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稀缺程度趋0的条件下只能以成规模集中劳动来替代资本”的理论。如毛泽东1957年高度评价的厉家寨，从1955年成立合作社以来先后集中投入1500百万个工日、仅钢钎铁锹铁镐这种简单工具就磨耗了几十吨钢材，这种集体化条件下才能集中起来的劳动力投入，主要用于兴修水利搞农田整治，全村土地大部分可灌溉，产量随之大幅度提高。

在历史上类似这种改天换地最典型的是秦国李冰父子主修都江堰，理性地运作天然来水灌溉几十万亩盆地农业。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工程，标志了乡土中国传统灌溉农业的水平。同一时期在关中还有郑国人帮秦国修的郑国渠。以史为鉴，我们得明白，古代农业文明之所以拒绝西方奴隶制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文化，不仅因为

聚落而居，而是单家农户搞不成坑塘库坝和灌溉渠系！现在主流政策则是“去组织化”，把农民全打散了，还把单家独户经济搞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这就很难解决如何归集天然来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土地被化学化搞得板结严重，一方面下雨就成灾，另一方面个体农民的水利需求就变成在祖国大地的胸膛上到处打井，那就造成超采地下水。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 80% 以上！一般采用地下水 40% 以下的时候，天然来水还可通过渗漏或人工补水保持平衡，超过则保持平衡的能力就不存在了，现在华北超采过了 80% 还在继续打。西北干旱地区也靠打井超采地下水，这种生存方式对人类来说完全不顾子孙。

说当代的激进发展主义断子绝孙并不是骂人。大家平时把孩子当宝贝一样，但是真正对他们将来最大的不利是什么？是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那是不可恢复的。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不错，但他也不主张用这种伤及子孙生存的方式搞发展！

客观讲中国本来应该是一个干旱的、饥荒的国家，因为祖先留下来了利用二十四节气的本地化知识和群体文化基础上的灌溉农业传统，使得中国养活了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口。

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极限能养活一个亿，现在也测算了很多次，有人说极限承载能力是 15 亿，有人说 18 个亿，总之现在的资源条件利用好了承载人口的能力大约也就是 15 亿—18 亿。可如果进一步破坏资源，那再过 20 年左右能不

能承载这么多的人口，就很难说了，那个时候老一辈给自己打一针空气就安乐了，临终前还不负责地说一句“相信后代比我们聪明”，看他们怎么去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被破坏已经日益严重，使得我们的后代很难再生存了。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希望这一代人别那么愚蠢地固执着我们的错误，要想孩子，救救孩子，别把我们造下的问题一甩手留给他们！得做点反思，得有点诚意，至少得让后代能接受我们的教训。

我这个序言说了得罪人的话，再次向各位读者、特别是跟我一起犯过很多错误的同代人表示歉意。你们不反思我没意见，但是希望允许我反思。总之每当说到这儿的时候心里边很尴尬，因为我这样做反思，很多我的同代人在批评我，压力很大。

因此，希望同代人自我反思，也是我认同此书立此存照的原因。

以上这个粗线条的历史比较，应该算是我们理解王景和 10 年心血形成的四卷本丛书《最后的乡村——中国乡土影像志》的基础知识。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自序

把镜头伸向农村

我是新华社的老记者。

在记者岗位上，我曾连续 17 年从事农村报道，足迹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对大包干后的农业机械化、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农民地位、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承包制的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诸多农村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过专题调研和报道，有多篇作品在全国产生较大反响。自我感觉，虽然不是名人，但也小有成就。

2004 年 2 月，我从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岗位退居二线，再有两年就退休了。退休后的生活怎么过？在不少人的心里，退休就是退出历史舞台，退休就是人生的终点。可我却觉得，六十退休，这恰是人生的新起点。从这时起，生命已完全属于自己，生活有了充分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干一些过去想干而没有时间干的事。

我选定的项目是摄影，“让照片记录历史，

让历史记住照片”是我的追求。我的计划是，退休以后，开着自己的车，带上照相机，到山乡草原，到街头巷尾，去捕捉自然，捕捉美，捕捉快要消逝了的历史。

为此，我还写了一首诗，叫六十生日感怀：

花甲常悲人生短，
岂知退休路更宽。
功名利禄成过去，
山乡原野有新天。
莫言须发银如雪，
且看老身志犹坚。
跃马横刀重上阵，
再展宏图六十年。

我这里说的“马”就是车，“刀”就是照相机。

2005 年 6 月，我花 9 万多元买了车。

2006 年 3 月退休后，又花近 3 万元买了相机和镜头等。“马”和“刀”都有了，我开始筹划“中

国城乡万里行”。

2007年4月2日至12月30日，我这个驾龄不到两年的新手，带着老伴，开着买了不到两年的捷达车，搞了一次“中国城乡万里行”。从北京到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再从广东到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然后返回广州，经湖南、湖北、河南回到北京，历时9个月，走行16个省（市、自治区），行程27000多千米。一路上，我边走边拍照片，边走边发博客，回到北京时，已发博客200余篇，等于是花国家一分钱，给国家做了一次图文并茂的宣传。

一路上，我基本不走高速，而是走国道、省道，目的省点过路费，更主要的是可以随时停车拍照，随时走乡进村，接触群众。住的地方不求高档，基本都是小旅店、小宾馆，我的要求不高，一是房费低，二是能停车，三是能上网更好。至于吃的，更是简单，街头小饭馆，随便点

两个便宜菜就行了，但晚上得喝上二两。我的作息时间是，白天开车转，晚上早睡觉，早上两三点钟起来写日记，整理照片，发博客。

一路走，我一路激动着。山东的大海，江苏的麦田、浙江的千岛湖、江西的三清山，福建的土楼，广东的碉楼、三亚的台风、广西的梯田、贵州的大山，云南的红土地和梅里雪山，每一处壮美的风光，都让我激动得心蹦蹦直跳，常恨手中的相机不听使唤。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农村。在天津，我采访了当年江青的“典型”小靳庄和禹作敏后的大邱庄；在山东，采访了农业学大寨的老典型下丁家、厉家寨、大渔岛；在上海，采访了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在浙江，采访了“江南大寨”上旺。这些老典型的今与昔，让我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河北和山东，我观察了村庄的变化，亲历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在江苏的华西村，我观察和

思考了四天；在广西，我访问了三处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在贵州、云南的大山里，我看到了一处处散落山间、十分简陋的小木房。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新农村建设，前景美好，但任重道远。

更难忘的，是住在村里，住在农民家的感受。在山东一个叫鱼鸣嘴的小岛上，我一连住了10天；在福建西北的小山村里，我住了一个礼拜；在广西龙胜的大山里，我住过瑶家、壮家；在贵州、云南的高原上，我曾在布依族和藏族家里过夜。我访问过的村寨有侗族、水族、傣族、苗族、基诺族，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泸沽湖的摩梭人家里，我吃到了新杀的猪肉；在广西侗族的早餐桌上，我喝得酩酊大醉。这一切，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忠厚与纯朴。

“万里行”归来，许多朋友劝我编本书。编什么书呢？有的说，编本旅游日记，用你的镜头介绍祖国美好的山川田园。有的说，你是退休老人的楷模，把你的游历写出来会对大家如何过好后半生有启示。我思谋再三，觉得主题难以确定。不过，回过头来看，我所拍的照片大部分是农村的，我所发的博客也大部分是反映农村的，何不就编一本《中国乡村图说》呢！

我知道，要编这样一本书，仅有这一次万里行是不够的。我计划，再用两年的时间跑中国的东北、西北和中部，但转过年来，家里有事，跑不成了。但这几年来，我还是抽时间跑了北京郊

区、四川灾区、河北张家口、山东半岛、陕北佳县、安徽徽州、西安郊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村，补充了大量反映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的图片。加上以前跑过的新疆、甘肃，我已经探访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编辑这本书的图片基本够用了。

这套丛书主要是由图像构成的，但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摄影画册，不是单纯地从摄影艺术的角度去描绘乡村。我是想站在摄影之上，用社会学的和历史的的眼光，对中国乡村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多角度的展示，为读者描绘出中国乡村的广阔的社会图景，

在图片拍摄和书稿编辑过程中，我力求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观察中国乡村，即不仅看现状，而且看历史，看变化。也就是说，不仅从横向上反映东西南北中农村、农业、农民的面貌和不同特点，而且从纵向上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我想以直观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图片和同样朴实无华的文字告诉人们：中国的农村什么样，中国的农民什么样。让人们大略地了解中国农村的现时状况，了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进而去思考中国农村的未来。

本书共分四卷。

第一卷《古村掠影——中国的村落与民居》，主要介绍中国村落的形态、中国的新村建设、各地民居的差异和变迁、村落和民居变迁中的隐忧。

第二卷《斯土风情——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主要介绍乡间饮食、服饰、民俗、乡间用具、乡间艺术、乡间旅游等生活方式方面发生的变化。

第三卷《铁犁挽歌——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变革》，主要介绍农村耕种方式、收获方式的变化、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农村物流的变化。

第四卷《家园守望——当代中国城乡转型中的新农村》，主要介绍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情况，并由此提出了几个问题：将来谁来建设新农村？纯朴乡风能否持续？能工巧匠的班谁来接？乡村环境如何治理？

我深知，中国疆域广大，国土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风土人情也颇有差异，我不可能把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走遍，把各方面的情况都吃透，况且我还有重庆、青海、宁夏、西藏和台湾没有去，因而书中介绍的情况难免有挂一漏万或以偏概全之嫌。在这里，我恳请读者朋友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和指正。

引言

中国的村落什么样？中国农民的居住状况如何？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感兴趣却又懵懵懂懂、不甚明了的问题。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许有机会到乡下去转一转，看一看，但他们看到的往往是局部，是一个或几个点。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对农村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自己居住的村落，无法了解整体。

中国地域极为广大，高山、平原、丘陵、江河湖海之边，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社会发展状况不同，村落和民居的形态也大有差异。这些差异，不但表现在地域空间上，而且表现在历史跨度上。

本卷的宗旨，就是从宏观和微观、空间和时间等多个角度，展示中国村落与民居的形态特点和历史变迁。

本卷由五个章目构成：第一章，中国村落的形态，既有对中国村落形态的整体考量，也有南

方村落和北方村落的对比介绍；第二章，中国的新村建设，主要介绍中国村落的发展变化；第三章，中国民居的差异，从微观角度考察南北方、东西部的民居，并展示民居的各个居住要素——院落、仓储、围墙等；第四章，中国民居的演变，展示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的发展变迁史；第五章，变迁中的隐忧，揭示当代中国在城市化进程的裹挟下一些村落逐渐凋零、消亡的现实，以图唤起社会保护古村落、保护传统中国生活样本的意识。

中国的村落和民居，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后的这30多年，也可以说在这30多年中国乡村发生了“异变”，即超常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本书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

应该说明的是，我不是学者，本书不是从学术上对中国乡村的村落和民居进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而是从记者的角度，运用社会学的思维，以图片说话的形式，对中国的村落和民居进行社

会和历史的考察。通过这些直观的具体的图像，
人们可以对中国乡村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做更
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